

格瓦拉重返中国

——从一出戏剧的角度看

·黄纪苏

将近 10 年前我跟一些朋友想把格瓦拉搬上中国舞台，当时我们找到今天会议的主办方拉美研究所，找到刘承军同志；后来我们又找到今天会议的东道主古巴驻华使馆。我们得到了无私的帮助。

中国人最早知道格瓦拉，是在 20 世纪中期，当时的世界社会主义欣欣向荣。在旧大陆的西部出现了以前苏联为首的一群社会主义国家；东部出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、越南和朝鲜；在新大陆的裂缝处又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古巴。格瓦拉、卡斯特罗洋溢着青春的面容，充满了理想的目光，在那个年代就像旭日、朝霞一样，链接了一种新的生活，指向着一个新的世界。

70 年代之后，格瓦拉以及回荡在南美山林里的枪声就告别了中国，这一别就整整 30 年。30 年间，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改道。国家主义型的社会主义不数 10 年而破绽百出，尽显败相。这样的历史改道有其深刻的必然性。《共产党宣言》以来的现代社会主义运动，是人类在社会制度上告别旧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出走，极尽艰难悲壮。它的光荣是天然的，它的失败也是自然的。

但社会主义，无论它叫什么名字，也无论它现多少化身，它所体现的人类对社会平等的追求，同人类对社会不平等的追求一样原始，一样颠扑不破。其实，放在一个大的时间尺度上，从社会主义的这轮挫败中根本引不出“历史终结”的话题。恩格斯说，现有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史前史。钟摆摆过去了，还会摆过来。90 年代以来，随着爱国主义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再次登陆民间，格瓦拉这位社会平等社会正义的战士重返中国，便顺理成章了。

但经历了沧海桑田的中国与世界已然不是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了。这位重返中国的

格瓦拉将面对什么呢？他首先面对的是既得利益群体尤其是主流知识分子的深刻质疑。这个群体在过去 30 年里大梦醒来，重新“觉悟”到一个人剥削人、压迫人的社会乃是人类世界万古不易之道。

这个群体就是带着这个觉悟重登社会不平等的跑道，他们争先恐后，跑得四蹄生风。这些社会股民对格瓦拉所在的社会主义事业彻底幻灭，对平等正义等价值早已清仓。

但新的历史反弹业已开始。《切》剧舞台上格瓦拉年轻时代漫游南美大陆时的所历所感，跟早被公众厌恶以至厌弃的传统阶级教育，本来在内容上并无本质区别，居然使得台下许多观众热泪盈眶。这里固然有表达手法上的原因，但离开了 90 年代以来的贫富分化的社会大背景，是无法理解的。舞台上借格瓦拉之口说出的“誓死保卫社会主义”，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——透过现场那迟疑了瞬间才爆发的掌声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本义从历史的歧路中越蹶而出，终于和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的现实需求再次相遇。许多人通过舞台上的格瓦拉重新燃起了对新世界新生活的想往。当然，反弹还包裹着重重疑虑，对于部分知识分子尤其如此。我还记得一位中年资深女记者站在剧场门口的台阶上对我说：演出结束时她也热泪盈眶，跟大家一起唱起《国际歌》，但一边唱一边“警告”自己“社会主义彻底完蛋了”！还有些观众说他们在剧场里热血沸腾，出来被风一吹，痛感什么都没发生，什么也不会发生。一出关于格瓦拉的戏剧所以引起那样广泛的立场对立，那样激烈的内心冲突，正说明了社会心理正在发生大的——虽然还远不是根本的——转折。

格瓦拉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彻底革命者。他的内心长存一种忧患：怕自己脱离人民，怕自己以人民的名义忽视了人民，背叛了革命的理想。为此，他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克己奉公，艰苦奋斗，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作革命人格的修炼，以此使自己置身人民中间。他最后甚至放弃高位，重返丛林做一名游

黄纪苏
格瓦拉重返中国
——从一出戏剧的角度看

Journal of Latin
American Studies

21

击战士。他不但在自己的生命中阻截了“打家劫舍受招安”的历史循环，还为20世纪那场因严重官僚化、体制化而面目不清的革命留存了一份珍贵的底本：追求社会公平的理想主义者会面对各种体制化的挑战。在当下中国，来自市场体制的考验日益严峻。目光忧郁、神色坚定的格瓦拉则为重新出发的理想主义者竖起了一道安检门：伪装的人、投机的人、起哄的人到此止步。

格瓦拉的一生可用“取义成仁”一言蔽之。“舍生取义”的价值观恰恰是他再次登陆中国的缘由所在。在迅猛发展的中国，人们的价值观在不断发生裂变。最近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民众表现出的舍生忘死、奉献他人的例子比比皆是，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带来极大的社会激荡。但是其间也不乏“利”字当头，苟且偷生的小人。这种趋利避害的自由主义经典场面，与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中以流血布道、以牺牲弘法、处处闪耀理想光辉、体现人道精神的行为形成耀眼反差。我们也把社会上不乏其例的这种反差放到了《切》剧舞台上，让不

少人感到不自在：有人“出冷汗”，有人觉得这是在进行“道德拷问”，有人产生“逃走”的想法。其实让剧场外更多人不自在的，是市场经济向市场社会的恶性膨胀。

三

格瓦拉重返中国，受到了普遍的热烈欢迎，但也遇到了种种误读。这些误读绝非偶然，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原因。首先，面对格瓦拉这样一个所向披靡的符号，我们社会的既得利益群体一方面坚决抵制，斥之为“疯子”“暴徒”，一方面取出手术刀，通过阉割其社会革命的本质而将其“无害化”。这一切都得到市场势力的极力怂恿和大力配合。格瓦拉牌商品，从各种小饰物到格瓦拉的语录画传，无非是放干了格瓦拉的精气神，将他制成一具徒具皮肉的玩偶。

格瓦拉所重返的中国还在未定之天。格瓦拉会以他不变的本质，为中国、为世界带来新的变化，蕴含了旭日和霞光的变化。

伟大的思者和行者——格瓦拉

埃内斯托·加西亚·菲奥尔

1928年6月14日，埃内斯托·格瓦拉·德拉塞尔纳出生在阿根廷。他是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坚持国际主义革命思想的人。这些先进的思想一直伴随着他的行动，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分钟。

他曾经说过，作为拉丁美洲这个伟大祖国之子，他准备为拉美大陆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事业献身，既不求助于人，无所求，也不利用任何人。

起初，他的使命是做一个为人类尽职的革命医生。在参加了古巴的起义斗争之后，他成为国际主义的游击战士，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担当起社会主义新型社会组织者和建设者的任务。而最终他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起回归到游击战的斗争中。这一过程如同一个完整的圆圈，既把他的思想也把他的行动全部包含进去。所有这一切都与其思想的三大基石紧密相连，这就是：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，革命战士的道德观和他关于“新人”的观点。

格瓦拉在其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性格。据某些传记描述，他生性顽皮，与父

母和老师之间的争论非常生硬激烈，经常做出冒险性很强的尝试，他的言论带有挑衅性，总是力求捍卫与对方相反的立场。

严重的哮喘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童年时代的特点。哮喘病的发作是持久而剧烈的。为了同疾病做斗争，他不得不遵守严格的饮食规定，并接受那些限制他活动的治疗。但这反倒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读者，也为他注入了遵纪守法和自我控制的强大精神源泉。

1942~1964年，在阿根廷发生巨大政治变革时期，切完成了中学的学习。然而与某些传记通常描述的反相，格瓦拉在谈到他本人的时候说：“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没有对社会的担忧，也没有参加过阿根廷的政治或者学生斗争。”

在青少年时代的最后几年，如果说在格瓦拉身上开始显露出鲜明的思想意识的话，那就是他的反帝立场，特别是坚定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立场。这是一种深深植根于阿根廷政治社会文化的思想意识。